

湖西红色报纸的编印之旅



现珍藏于红色湖西文化教育基地的印刷机



《湖西日报》前身《团结日报》印刷地旧址——张花园村抗日根据地张学富故居

在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湖西文化教育基地,长期展陈一件珍贵的文字印刷机,仅存的锈迹斑斑的骨架好像仍在“运转”,“印刷”着80多年前湖西军民同仇敌忾、冲锋陷阵的英雄身軀和冲锋呐喊。

同沂蒙一样,湖西也是革命老区。湖西位于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,因在山东微山湖、昭阳湖、独山湖、南阳湖以西,故称湖西。

抗战时期,湖西区是与冀鲁豫区、豫皖苏区齐名的抗日根据地。单县则是湖西区的中心,是湖西区党委、专署、军分区所在地,被誉为“湖西革命的摇篮”。

1938年12月,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从山西东进湖西区抗日。次年1月,685团与当地抗日武装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。

苏鲁豫支队连战皆捷,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,更提振了军民作战士气。于是,中共

中央山东分局决定,建立中共苏鲁豫区委员会(简称苏鲁豫区党委,也称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、湖西区党委),隶属山东分局。

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,增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,进一步打开湖西区抗战新局面,苏鲁豫区党委在今日的朱集镇张花园村创办了《团结日报》。当时的张花园是湖西专属机关和抗日队伍秘密驻扎的“红村”。《团结日报》的印刷、发行就在抗日战士张学昌家的地窖里。

是年8月,敌情紧急,《团结日报》被迫停刊。湖西区党委把印刷机、铅字盘拆装箱,用几十辆木轮车,从张花园村运到区党委驻地鱼台谷亭镇,后从沛滕边县委借来几艘大木船,装上印刷机、铅字盘,在微山湖上边战斗边坚持工作,湖东游击队担负起保卫报社的艰巨任务。

形势略为好转后,报纸印刷设备又运回单县东南部的抗日根据地,继续秘密出版发

行。1940年底,中共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,《团结日报》成为湖西地委机关报,更名为《湖西日报》,湖西地委宣传部部长郝中士兼社长,鲁奇任副社长。

《湖西日报》为4开2版,每周两期。报社除及时传播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、战斗消息及全国抗战斗争形势,还特别收发新华社新闻,刊载并出版了《论持久战》《论新阶段》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等著名文章。

《湖西日报》刊登的文稿由编辑部编写后,交给交通员送到印刷厂,报纸印好后,再由交通员背送到交通局发行。之前《团结日报》为油印,每期仅印数百份。时任湖西抗日人民义勇队总队长李贞乾为报社搞到印刷机、铅字和铸字工具,吸收了排字、印刷专业技术工人。随着报纸改为铅印,每期可出版3000份以上,发行规模和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大。

1942年12月,日伪军1万余人向湖西根

据地“合围扫荡”。当时,报社印刷厂在秦庙村,印刷人员紧急转移,突破封锁,未受损失。第二年初,湖西区斗争形势愈加严峻,报社印刷厂转移到谢油坊村,在新挖的地道,用汽灯照明,坚持秘密印刷。敌人来“扫荡”,印刷工人用泥土封闭地道口,并覆盖柴草,在敌人眼皮子底下,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印刷。

日本投降后,《湖西日报》报社迁入丰县县城,1946年1月更名为《湖西大众报》,改为双日报。6月,蒋介石发动内战,国民党军队进攻鲁苏豫皖解放区,报社随湖西区党政机关转移,并组建了武装宣传队,配合解放军开展对敌斗争,直到1948年底停刊。

从1940年底到1948年末,从《团结日报》到《湖西大众报》,这份红色经典刊物走过了8年的光辉历程,为宣传推动湖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文图 通讯员 刘厚琨

曹叔振铎传说

古曹国是菏泽市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、资料保存最多、对菏泽影响最大的一个诸侯国。曹叔振铎,是古曹国的开国之君,中华曹姓的始祖,我国奴隶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。

据《史记》记载:“武王已克殷纣,封叔振铎于曹。”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1016年,他执政30年。奉行“上忠周室,下爱黎民”的国策,反对分裂,维护统一,对于促进周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应有作用。在他的治理下,古曹国呈现出政治清明、民风清纯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。为定陶和菏泽成为“天下之中”打下坚实基础。几千年来,有关曹叔振铎的传说不绝于史。

在民间,广泛流传着曹叔振铎很多由人到君、由君到神的优美故事。

曹叔振铎传说,源于定陶区。自曹国建立算起,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,有着与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。曹叔振铎去世后,葬于定陶城北仿山古墓群,这里已经成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,已发现的文物有曹国君振铎鼎、曹公簋、曹公子沱戈及大量其他铜、陶制品。如在仿山附近出土的曹国陶豆、陶盆、陶釜,还有用于制作陶器的工具陶拍等。有关曹叔振铎传说,内容广泛丰富,表现形式多种多样,有墓地、碑文、家谱、村志、庙会,有戏曲、快板、大鼓、民歌等。史料丰富,真实可信。曹叔振铎传说深深扎根于民间,有着浓郁的鲁西南特色。如《曹天王“三招”安天下》《曹天王行雨》《阿谷停云》《仿山庙会》等故事,流传全国。

曹叔振铎的祖辈可以追溯到人文始祖轩辕皇帝。在民间,人们常常把曹叔振铎与轩辕相提并论。轩辕因有土德之瑞,世称黄帝;振铎因是武王之弟,人谓曹叔。黄帝播百谷,制衣冠,建舟车,制音律,著《内经》,造福人类。振铎承先人之风,励精图治,施仁政,爱万民;兴水利,种五谷;开路衢,倡贸易,“三招”而兴天下。振铎逝,官民皆以曹天王称之。世人说:菏泽乃曹国之疆域,曹州之故土。即源于此。曹叔振铎被民众神化为天上的“曹王爷”,为百姓下雨保禾、祛病解灾、送子造福、发家致富等,充分反映了基层民众对“明君清官”的赞美和期盼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,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和珍贵的艺术价值。曹叔振铎被后人奉为降雨救民的“天王”,从公元前5世纪的诗歌《下泉》中,就可透出端倪:“芄芄黍苗,阴雨膏之。”“阴雨膏之”,就是用水滋润的意思。这是产生于古曹国的一首民歌,是古代菏泽民众对首任国君曹叔振铎的一种怀念、赞颂的反映。曹叔振铎传说对于《诗经》特别是《曹风》的形成,有着直接的影响。收录于《诗经》中的《蟋蟀》《候人》《鸛鸣》《下泉》4篇作品,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愿望,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之一,也是菏泽大地上古代人民对于中华文艺宝库的巨大贡献。

古曹国是在菏泽历史上存在最久、影响最大、资料最完整的奴隶制国家。在我市以曹字冠名的县乡村有200余处。在全国以曹字冠名的州县区、乡镇、村庄,达2万余处。古曹国所采用的历代国君叠加式墓葬方式,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墓葬格局,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2020年我市成武县编修的《三师堂·曹氏族谱》,清楚地记载了曹叔振铎之后三千多年的血统脉络,一百零三代的世系图谱,以及有关的大批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实业家的简要事迹。这是菏泽历史上其他名人所不具备的。

有关曹叔振铎传说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,还是虚构的;无论是人间的,还是天上的,都是积极向上向善的,都具有教育意义。

曹恒顺 曹利永 马刚

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

阳城村位于郓城县县城西北30千米处,黄河南岸,距黄河河道约1000米。属黄集镇管辖,距镇政府驻地3500米。

据《王氏族谱》记载:王氏祖王信在明朝洪武二年(1369年)从山西省阳城县迁到这里。当时,这里就是一个村庄。因地震、水患等原因,原来的村民已不知去向,村庄空无一人。为永远记住故乡,王氏祖就把村名叫做阳城。

清朝末期属郓城县管小庄里,1928年隶属郓城县九区丽远乡,1938—1946年属寿张县五区。1947年归鄆城县八区,1958年初属黄集乡,同年秋建刘仁大队,归李集公社。1962年归黄集公社,同年从刘仁大队分出,成立阳城大队。1984年改为阳城村民委员会,归伟庄乡。2001年归黄集乡,2017年撤乡改镇,归黄集镇管辖。

这里有一个“狮子红眼,扁担开花”的传说。

据传,阳城原来是座城市,南门西边有两座石头狮子,威风凛凛,栩栩如生。传说,曾有一年轻后生,智力稍差,但心地善良,十分孝顺。他父亲去世较早,母亲身有残疾,腿脚不方便行走,不能干农活,年轻后生就经常背着母亲去阳城赶集,为母亲消闷解愁。有一天,阳城大集,年轻后生背着母亲在集上闲逛。母亲比划着饿了,后生急忙把母亲背到包子铺门口,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文钱,为母亲买了一个热乎乎的包子。看着母亲大口吃着包子,后生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后生的行动感动了上天,这时走过来一个地理先生,对他说:“你是个孝顺儿子,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阳城‘狮子红眼,扁担开花’,那就是要塌地陷,要顺着南门往南跑,千万不要回头。”

一天,阳城又是大集,后生背着母亲在街上看人来人往。日到中午,一个小学生放学路过城南。只见他放下书包,取出朱笔,往狮子眼上抹了两个红眼圈;一个农夫用扁担挑着柴火去城里卖柴,用卖柴的钱给女儿买了几朵鲜花,没有合适的地方放鲜花,只好插在扁担上,也要出南城门,这一巧合现象正好被后生看到,后生急忙背起其母亲就往城外跑,并大声喊道:“大伙快跑,危险了,‘狮子红眼,扁担开花’,阳城要塌地陷了。”他边跑边喊,很多人也跟着他出城去。出城后跑出很远,回头看,发现城内天塌地陷,墙倒屋塌,许多人被陷进地下。他背着母亲躲过这一灾难,跟他逃出来的人纷纷向他磕头致谢。

据史书记载,阳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地震。阳城村呈长方形,东西长320米,南北长360米,有王、李、高、张、郑、鲍六姓。全村地势平坦,阳城沟横穿全村,水利条件优越,适宜种植小麦、大豆、棉花等农作物。阳城村村内有预制件、钢球生产企业6家,产品销往全国各地。依托黄河资源,有人搞起了黄河旅游,带动了民宿、餐饮、运输等行业的发展。现在的阳城,杨树耸立,柳枝吐绿,繁花似锦。村内随处可见干净的墙面、平整的道路,绘就出了业兴村强、民富人和、美丽宜居的新画卷。

魏建国



民谣曰:阳春三月好暖和,没风没火没浪波。小他爹,撑船啰,小他娘,撒网了;小妮妮,背起鱼篓跟上了。天黑收网了,他爹累得手酸了,他娘累得腰酸了,小妮妮喜得没人管了,一船鱼也扑扑通通跳回湖里了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河塘水位浅,无工业污染,鱼虾众多,靠打鱼谋生的渔家,小舟一叶,鱼鹰数只,悠悠然漂泊于绿水碧波之上,只有收获之利,却无辛劳之苦,真乃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

放鹰人一般养着十几只鱼鹰,它们停息在船两边的支架上,呆头呆脑地打着瞌睡。捕鱼时,随着放鱼鹰人的吆喝和催赶,那些鱼鹰便先后钻入水中,追逐鱼群。捕鱼前,渔家要用马莲把鱼鹰的脖子系好,不能太紧和过松,太紧鱼鹰得不到呼吸会窒息,太松了鱼鹰抓到鱼后会就势吃掉,吃饱了的鱼鹰是绝不会捉鱼的。

鱼鹰个个是捕鱼高手,在船上看起来木讷迟钝,在水下则是戏水高手,如离弦之箭一样追逐鱼群。不一会儿就有鱼鹰嘴里叼着一条大鱼上浮出水面,放鹰人立即驾着小船追过去,抄起船上的大网兜,把鱼鹰抄上渔船,一手提着鱼鹰的脖子,一手把嘴中的鱼抠出扔进鱼舱,随手再把鱼鹰抛入水中。紧接着,其他鱼鹰也都叼着鱼儿先后浮出水面,纷纷朝着小船游来,战利品有鲤鱼,有鲶鱼,也有黑鱼,放鹰人喜不自禁,忙活着收鱼。

夕阳西下,放鹰人看鱼篓已满,就把鱼鹰脖子上的马莲除掉,再把它放回水中,这时的鱼鹰们似脱缰野马,精神抖擞,追逐更来劲了,它们抓住一条吃掉一条,饱餐一顿,放鹰人也准备驾驶着渔船返航了。

渔人们不仅能够享受收获和悠然,他们的伙食也不错,煎鱼、炸鱼和鲜鱼炖豆腐等,在那粮食紧缺的年代,可谓美味佳肴。文/丁明烨 画/王世会

春秋时代,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,国与国之间不时爆发冲突;在国内的朝堂之上,朝臣之间也经常互相攻讦。宓子贱是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,他在治理单父时,曾经遇到了不少大事,而且,如果不慎重处理,就会有身家性命之忧。所以,他在上任前,就做了许多工作,而且,他也总是按照老师孔子的思想来处理事情,因为他知道,在鲁国,孔子的思想影响很大。

掣肘难书

《吕氏春秋》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。宓子贱在到单父任职前,害怕鲁哀公听信谗言,干扰自己的治理方式,于是,在向鲁哀公辞行时,专门请求鲁哀公派信任的身边官吏和自己一同上任。当单父的官吏都来朝见时,宓子贱让这两个官吏记录。两人刚开始写字,宓子贱就从旁边拉扯他们的手臂。所以,两人总是写不好字。宓子贱发怒了,写字的两个人也非常生气,就辞职回去了。宓子贱说:“你们写得不好,赶紧回去吧!”两人回去后就报告了鲁哀公,说:“没法给宓子贱作记录。”鲁哀公说:“什么原因?”两人说:“他让我们记录,又不停拉扯我们的手肘,写得不好我们又发怒,官吏都笑话他,所以我们辞职不干了。”鲁哀公感慨地说:“宓子贱这是在劝诫我的过错啊。我扰乱他的工作,让他不能施展主张,必定有多次了。要不是你们两人,我几乎犯错。”



放鱼鹰



育大家尊敬兄长了;朋友十一人,可以教育大家学习的道理了。这是中等的善事,中等阶层的人 would 依附,但还是不够。”宓子贱说:“这个地方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个,我向他们请教,他们都教给我治理政务的方法。”孔子说:“想成就大事业,就在于这里了。从前尧、舜不抬高自己,放低姿态,用来听取观察天下的事情,找来贤德的人。这样推举出的贤人,是带来各种福气的根本。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,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很大,就会成为尧、舜那样的人了。”

从这些方面来看,宓子贱是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思想的,孔子对宓子贱也是非常赞赏

的。但有一件事,虽然宓子贱受到了鲁哀公的赞成,但民间却引起了争议,这就是收麦事件。

一岁之麦

“民以食为天。”在历朝历代,粮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,春秋时期更是这样。但宓子贱却和别人的思路不同,于是历史上有了“一岁之麦”的典故。西汉贾谊的《新书》记载了宓子贱的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。在宓子贱任单父宰的时候,齐国进攻鲁国,取道单父。这个时候,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。听到了消息,宓子贱就关闭了城门,严禁出入。当地的父老向他请求说:“麦子成熟了,如今齐国的兵来得紧迫,赶紧让城里的百姓出城把近郊的麦子收了吧,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粮食储备,而且不会资助给敌人粮食。”父老三次请求,宓子贱都不答

应。不久,麦子都被齐兵收割走了。鲁国的大臣季孙知道后非常愤怒,派人责备宓子贱说:“这不是很悲哀吗?老百姓冬天耕地夏天锄地,还不一定得到吃的。不知道这件事就算了,你知道了还有告诉你的,为什么你不听?”宓子贱恭敬地说:“今年没有收获麦子,明年可再种。如果让不种麦的人得到麦子,他们就会高兴有敌人来进攻。而且一季的麦子不会强大鲁国,丢掉了也不会减弱鲁国。如果让老百姓有了不劳而获的思想,这个念头一定会好几年不能消除。”季孙知道后,很惭愧地说:“如果地上有洞,我怎么能忍心见宓子贱呢?”

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宓子贱的治民思想,也有人称赞宓子贱的做法。实际上,宓子贱只是从他自己方面考虑了不让老百姓有不劳而获的思想,那么,我们反过来看,他这样做,会不会激发齐国不劳而获经常来进攻的思想呢?这是不是有资粮资敌的嫌疑呢?如果以后每年的麦收,齐国都来进攻,宓子贱都这样做,老百姓难道就年年白白种麦了吗?齐国有些麦子当军粮长期围攻又怎么办?再说,宓子贱一开始自己主张的治政方式是听取当地贤德人的意见,但这次为什么不听呢?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?

其实,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如宓子贱那样的只有一种,他完全可以敞开城门,规定好时间让百姓去自由收麦,让地多的人去雇佣无地或地少的人帮助收麦,并提高雇佣工钱,而借机偷盗麦子的按照法令来治罪就可以了。这样既收了麦子,也不会让敌人得到麦子。

敌人来了,坚壁清野才是正确的做法,宓子贱这样做,应该是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所导致的。

张长国